

#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印尼民族主义:历史的分析 (2)

中国:梁英明(印尼归侨)

##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共和国政治

苏加诺建立的民族党开创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时代。苏加诺及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哈达(Mohammad Hatta)、沙里尔(Sutan Sjahrir)等均遭荷兰殖民地当局逮捕流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度尼西亚前夕,荷兰殖民地当局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及抵御日军进攻的需要,将哈达和沙里尔释放,并支持他们建立抗日组织。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后,苏加诺也获得释放。这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先驱在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创建共和国的斗争中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另一方面,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为拉拢收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于1943年拼凑了一个称为“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教大会”的伊斯兰教政党,印尼文简称为马斯友美(Masyumi)党。该党团体成员包括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和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两大穆斯林组织,以及某些伊斯兰极端派著名领导人。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中首次提出建国五项原则,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指导思想,称为“潘查西拉”(Pancasila),获得与会者赞同。“潘查西拉”五项原则的内容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或人道主义;民主或协商制;社会繁荣或社会公正;信仰神道。这五项原则后来被纳入印度尼西亚宪法,顺序略有变化,内容则没有更改。

“潘查西拉”确认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信仰神道”,但并没有

规定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实际上承认多元宗教的合法性。其后,苏加诺等民族主义领导人在政治上争取获得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支持而接纳了他们提出的“雅加达宪章”,内容包括规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须以伊斯兰教法为准则”等,但没有接受将伊斯兰教定为印度尼西亚国教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仍奉行“潘查西拉”为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后来进一步确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孔教)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宗教。这说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一个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极端派主张的政教合一神权国家。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经历了5年的艰苦抗荷独立战争,终于迫使荷兰政府同意签署海牙圆桌会议协定,放弃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并最终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移交主权。马斯友美党为了与当年日军占领当局切断瓜葛,于1945年11月7日宣布重建,仍沿用旧名。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马斯友美党在荷兰及英美殖民者的支持下,在农村的影响力有所扩大。1950年在印度尼西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马斯友美党获得49席,民族党获得36席,马斯友美党成为第一大党,并与另一个右翼政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合作组成联合内阁,马斯友美党领导人纳席尔(Natsir)担任总理。然而,由于马斯友美党人公开成立“伊斯兰教国”和“伊斯兰教军”,在西爪哇等地发动武装叛乱,纳席尔在舆论压力下于1951年3月辞职。4月,马斯友美党改与民族党合作组阁,由马斯

友美党另一领导人苏基曼(Sukiman)任总理。但是这届联合内阁的寿命也仅有一年。1952年4月,马斯友美党再次与民族党组建联合内阁,由民族党领导人韦洛波(Wilopo)任总理。一年后,两党因政见分歧无法继续合作而分手。1953年7月,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在一些小党支持下成立了以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为总理的新内阁,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均未入阁。这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派在共和国建立伊始的国家领导权争夺中以失败告终的时期。

从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开始,印度尼西亚政治回到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路线,反映了代表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潮的马斯友美党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走向衰退,该党离开了印度尼西亚政权的核心理念,只能继续在农村地区不断发动武装叛乱活动。1952年5月,原来作为马斯友美党重要成员的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宣布脱离马斯友美党。此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穆斯林团体,它与其他穆斯林组织分分合合,一直同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合作,在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温和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5年,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得到选民的热烈拥护,投票率达87.65%。马斯友美党在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地农村穆斯林的支持下,在新国会中仍占有57个席位,并力图与民族党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等组成联合内阁,但最终因立场不同而失败。接着,马斯友美党一方面继续发动和支持苏门答腊等地的

反政府武装叛乱,一方面又加入民族党人领导的第二届阿里·萨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政局动荡、危及国家安全的形势下,苏加诺总统于1957年3月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同时将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结束政党政治,由几个大党组成总统领导下的“互助合作内阁”。因为组阁方案未能实现,苏加诺又改而组建由无党派人士朱安达(Djuanda)为总理的工作内阁,直接向总统负责。苏加诺将这一新体制称为“有领导的民主”。这一变革立即遭到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强烈反对。

如果将苏加诺自1945年建国开始到1965年“930事件”后被苏哈托推翻的20年统治分为两个阶段的话,“有领导民主”体制的实施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史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这两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相互争夺,此消彼长。1960年8月,马斯友美党终于被中央政府下令取缔。此后直到20世纪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似乎丧失了影响力。

然而,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它将对面的两大新对手是迅速崛起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反共的陆军集团。在镇压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支持的各地武装叛乱中,苏加诺和民族党不得不依靠陆军集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则在城市工人运动及收复西伊里安地区的运动中日益壮大自己的力量。它在1957年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第一次获得了最多选票。1963年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收复西伊里安地区后,苏加诺总统虽宣布结束军事管制,但陆军集团已经形成一股苏加诺难以驾驭的强大政治势力。

1965年“930事件”前,印度尼西亚政局日益动乱。苏加诺为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提出了“纳萨贡”(Nasakom)的新概念。纳萨贡是由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印度尼西亚词语的词语拼成的新词。苏加诺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企图通过“纳萨贡”团结共产党人和伊联领导的伊斯兰温和派,压制右翼陆军集团的扩张。然而,“930事件”的结果证明,苏加诺和民族党高估了印尼共产党的力量而低估了陆军集团的反共力量。

“930事件”的起因是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无关的。然而,在苏哈托镇压和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过程中,曾经被苏加诺和民族党视为合作者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却站在陆军集团一边,伊联的青年团组织——安梭(Ansor)青年团的成员甚至参与陆军残酷杀害印尼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行动。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信仰的无神论与伊斯兰教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印尼共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了激进的“过左”口号和行动,更加激化印尼共与广大穆斯林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使伊联青年团一度沦为苏哈托镇压印尼共的帮凶。

2005年,美国一位电影纪录片制作者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到印度尼西亚寻访在“930事件”中参与屠杀印尼共产党人的原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所属安梭青年团成员,并拍摄他们模仿当年的杀人过程时,这些“刽子手”们竟然充满豪情而毫无悔

意。唯独时任伊联主席(后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的瓦希德(Wahid Abdurrachman)后来曾为当年安梭青年团成员的杀人罪行公开道歉。

苏哈托在“930事件”中曾利用这些反共的穆斯林来镇压印尼共。1975年,苏哈托支持下成立了称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长老会理事会(Majelis Ulama Indonesia, MUI)的机构,其成员包括伊斯兰温和派团体伊联及另一穆斯林团体穆罕默迪亚的主要领导人。苏哈托企图通过这个伊斯兰教的最高领导机构进一步控制广大伊斯兰信众。实际上,苏哈托并不支持伊斯兰极端派的主张,而是将伊斯兰极端派视为他的潜在威胁。他在掌握最高权力后,便立即无情镇压伊斯兰极端派组织,使它们在政治上不能发挥作用。然而,伊斯兰极端派势力也利用苏哈托反共的需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后,伊斯兰极端派组织立即东山再起。当年8月17日,一名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极端派传教士里基格·希哈布(Rizieq Shihab)宣布成立伊斯兰捍卫者阵线(旧译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它以捍卫伊斯兰教纯洁性为口号,不断煽动并组织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反对印尼世俗民族主义者的领导的中央政府,要求用伊斯兰教信仰取代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潘查西拉),以伊斯兰教刑法取代现代法律,要求建立类似中东某些伊斯兰教酋长国的神权国家制度。为此,他们以“道德警察”自居,禁止穆斯林与异教徒通婚,煽动穆斯林捣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制造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未完待续)

# 县长追问地方“油气份额”



■ 本报评论员:余凡

12月8日,在印尼地方收支规划管理的全国大会上,廖省莫兰迪县(Meranti)县长阿迪尔(Muhammad Adil)就该县有关油气收益基金(DBH)的问题,当面向财政部地区财务平衡厅厅长阿费尔曼(Luky Afirman)发难,言辞十分激烈,引发了国内各界讨论哗然!

《采访网》(Liputan6)于12日报道,财政部办公室专员尤迪努斯(Yustinus Prastowo)针对阿迪尔县长的不当言论提出反驳:“我们对莫兰迪县长的说辞感到十分不满和遗憾。县长很不‘公平’地形容财政部的官员为‘祸害’,这是误导性的荒谬言论。”

尤迪努斯澄清说,财政部根据现行的宪法规定,以能源部(ESDM)的石油产量为依据,计算出相关地方政府所应得的份额基金(DBH)。上述资金还按比例分配给接壤的县政府,以达到共同发展的宗旨。以今年为例,财政部已向莫兰迪县发送各种地区及乡村建设资金达8720亿印尼盾,占地方收支(APBD)的75%,比该县2220亿的纯收入(PAD)高4倍。

莫兰迪县在苏门答腊岛东岸,面对马六甲海峡。于2008年12月18日获准脱离望加丽县(Bengkalis),翌年1月16日成为县级行政区。县名取自三大岛,即莫尔堡岛(Merbau),朗桑岛(Rangsang)及得丙丁宜岛(Tebing Tinggi),面积3707.84平方公里,人口206116人。2020年失业率由5.93%升至7.94%;贫困人口25.68%。本届县长任期至2026年。

《点滴网》(Detik.Com)于12日援引阿迪尔县长的话:“今年我们只领到1150亿盾,仅上了约7亿盾。增加了产量,油价据称升至每桶100美

元,而配额却仅上那么少?”该县目前有222口油井,日产8000桶油。若加上今后计划投产的32口油井,预料2023年的产量将增至每天9000桶。“今年油价只以60美元计算,明年应调升至100美元。”

财政部专员尤迪努斯对于阿迪尔的评估给予剖析,首先,莫兰迪县今年度的产量有所下降,直接影响到DBH的配额。根据能源部的资料,2022年的产油量从248.97万桶降至197.02万桶,使DBH配额下调3.53%,仅分得1150亿盾。他建议县长关注如何增产。

尤迪努斯还提醒,莫兰迪县在处理中央的“专项分配基金”(DAU)及DBH时效率低下,比其他地区慢得多。截至12月9日,莫兰迪县在规定发放的预算中只用了9.76%,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3.73%。莫兰迪县2021年收到“部门及机构”(K/L)专用款1180亿盾,2022年收到1204亿盾。自从2016年以来,该县地方收支预算的使用率平均只有82.11%,截至12月9日的使用率还在62.49%的低标准,这如何能有效降低当地的贫困人口?

《第一新闻网》(Beritasatu.com)于16日报道,内政部计划于近日内传召阿迪尔县长。地方财务督导厅厅长法多尼(Agus Fatoni)表明,将安排阿迪尔县长与财政部、能源部相关领导进行协调,不对媒体公开;但是,会后的结果一定会尽快向各界民众公布。

法多尼坦言,这些年来中央政府经常与地方政府会面协商;然而,与会的不是地方领导人,而代表们回去却忘了向地方首长汇报,或只是片面不全的资料,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指示不能接轨。所以,让阿迪尔直接与各相关部门讨论商谈,应该能取得大家满意的结果。

《采访网》(Liputan6.com)于21日援引阿迪尔县长的话称,感谢内政部安排让他与财政部及能源部官员在内政部

议事厅(RSU)会面并讨论的机会。这次会谈是在地方财务督导厅厅长法多尼主持下,继续20日的议题。之前,廖省省长也参加了讨论。阿迪尔向记者表明,关于油气份额基金的问题已经圆满结束,财政部审核后会将把相差的款项补还。

《爪哇邮报》(JawaPos.com)于24日称,前内政部地方自治厅厅长梭尼(Soni Sumarsono)认为,关于莫兰迪县油气利润配额,相似的问题存在已久,向来,有关的资料都是由中央部门所掌控,地方政府大多数不太明白其中的曲折和算法,所以造成不需要的误解。

阿迪尔县长在屡次催问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忍不住恼怒而说出了不当的言辞。梭尼说,别的地区很可能也面对相同的处境。“如果地方政府沉默,并不代表他们接受。可能只是强忍下来而已。”他认为油气配额应该更公开,并由有力的部门进行协调监督的任务。

此外,国际改革计划协会(BRIN)观察员西蒂(Siti Zuhro)表示,数年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逐渐退缩,这可以从地方政府的权力逐渐减少得到佐证。在“就业法案”中,很多原本由地方政府批准及监督的权力被取消了,“这直接造成地方政府经济收益的减少。”

佐科维总统自就任以来,廉洁公正,政绩有口皆碑。很多政策决定都以国家长远利益、民众福利为出发点;但在实行时总会受到挑战,而被有心的“政治人物”所扭曲!

莫兰迪首府石叻班让(Selat Panjang)是盛产鱼虾、燕窝、硬壳粉及石油,设有木材加工,小型造船厂的宝地,想不到如今竟有25.68%的贫困人口!这究竟是时运不再,或因缺乏创新?为何留不住资金,引不来投资?是疫情影响,或治理不当?让人扼腕兴叹。

# 战胜疫情 开拓前进 迎接光辉灿烂美好的明天

■ 雅加达:沈伟真

多灾多难的2022年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任务和我们永别了,接着我们敞开心门,迎接充满希望的2023年来到我们身边。

过去的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全世界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时代,新冠疫情的肆虐,笼罩着全世界,80亿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苦的年代。这一年,有惊有喜,经过三年和新冠疫情艰苦的斗争,我们终于摆脱了灾难,迎来了光辉灿烂的灿烂的明天。

2022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苦恼、最难熬、最痛苦的一年。

新冠肺炎自2019年在全球暴发,病毒迅速的猖獗,没有一个国家能躲过这一灾难。三年了,疫情迅速蔓延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疫情的来到,就是灾难的临头。这个灾难来势汹汹,不到三年,全球80亿人口中,有一亿人中招感染到病毒,有100多万人死于病毒的侵害而死亡!真是晴天霹雳!哭天喊地,上帝也拯救不了这些不幸的群体!

新冠病毒的袭击,不仅给人类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在社会上更是苦上加苦。疫情的蔓延使到经济链顿时中断,工厂停工停产或关闭,失业大军猛增,随着物价大幅度涨价,真是到了民不聊生的惨相!趁着疫情肆虐,美国为了削弱俄罗斯,鼓励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这个局部战争却愈演愈烈,打了10个月,没完没了。欧洲人民却遭了殃,经济崩溃,能源匮乏,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全世界经济急速下滑,通货膨胀,大大威胁了人们的生活。在疫情和战争压迫下,人们叫苦连天,上帝也救不了这些受苦受难的贫穷苦难的老百姓。

印尼的情况和世界各国一样,也处在疫情侵袭的危机,虽然政府已经想尽办法,并得到中国政府无私的援助,赠送疫苗及医疗器械,挽救危机,及时为全国人民接种疫苗并努力抢救病情恶化的患者,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到2022年年底,疫情逐渐下降,人们的生活开始慢慢恢复正常。这是政府和全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人们希望,新冠疫情早日结束,还给全球人民健康和正常的生活。

和世界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疫情受到控制,起初虽然很严重,病疫来势汹汹,一下子,全国都受到感染,在党和政府努力抢救全国人民奋战下,制定了严格的防控疫情的措施,逐渐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使成千上万的民众得以解脱病毒的袭击,目前中国的疫情越来越好,人们开始了恢复正常的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病情“清零”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2022年,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危害了全人类,现在在疫情大体上已经受到控制,人民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苦难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人们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还给人民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平的环境,让全球人民早日摆脱“世界末日”的恐惧感。

2022年,虽然有灾有难,但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却平安度过。2022年,印尼的经济有所发展,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来往,有突飞猛进的事态,近年来,两国经贸来往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今后还会继续发展,特别是印尼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在两国经贸来往,印尼总是顺差,大大的推高了印尼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工农的发展,为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有目共睹值得高兴的事。

2022年,中国社会大大发展,虽然是遇到新冠病毒的侵袭,但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大大发展。2022年,中国成功举办冬季奥运会和冬季残奥会,成功举办影响全球的中国20大,选举习近平蝉联中共总书记,并制定了建国方略,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2022年中国航天飞船突飞猛进,中国的载人飞船连续两艘上天,其中一艘顺利平安返航,另一艘继续在天上飞行;中共20大以后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远大宏图为中国描绘了幸福美满的升华的远景。

2022年是印尼与中国友好关系全面发展的一年。印尼佐科维总统多次访问北京,中国高级官员也多次访问印尼,习近平主席还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峇厘举行的G20峰会,并和佐科维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签订了多项协定,为两国携手合作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相信,经过G20峰会的成功举行,以及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成功访问印尼,中国帮助印尼建设的“雅万高铁”列车顺利建设,“一带一路”方针的顺利进行,印中两国政府和人民一定更加的合作,为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为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多灾多难的2022年即将与我们永别,我们挥洒着泪水告别凶猛的“猛虎”年,我们摊开双手,迎接充满阳光和希望的2023白兔年的光临。我们要用奋勇猛进的精神,拨开云雾,撸起双手努力拼搏加油干,来迎接充满灿烂阳光美好的明天新的一年——2023年代到来。